

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

郑礼炬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浙东鄞县杨守陈家族文学的形成自其祖父杨范传陆九渊理学始, 而家族性文学创作绵延到杨守陞曾孙辈杨德周。在成化、弘治年间, 杨守陈、守陞两兄弟在翰林院中代表了与陈献章对抗的传统理学, 在文学创作上则反映了翰林院宗宋的大趋势。他们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

关键词: 浙东; 杨守陈; 杨守陞; 宗宋; 杨氏家族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 (2008) 03-0014-05

明成化、弘治年间, 传统程朱理学受到质疑, 理学出现新的学术流派, 陈献章 (1428-1500)、庄昶 (1437-1499) 等人融会佛学思想, 提倡以静坐修养, 形成“白沙学派”, 开始出现心学的萌芽, 一时影响极大。

同时, 在翰林院内部, 出现了以杨守陈为首的家族性翰林文学创作。浙江鄞县 (今宁波) 一带杨守陈家族, 自其祖父杨范以来, 形成家族性的程朱理学思想, 坚持北宋道学家的文学理论。杨守陈与其弟杨守陞、从弟杨守随等在翰林及中央各部任职, 前后达六十年之久。他们与翰林院内文学观念相近的一些作家, 形成成、弘年间另一股道学家文学创作流。

在明代中叶, 浙江鄞县杨家是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家族性官僚集团, 著名的有号称“五杨”的杨守陈 (1451 年举进士, 下同)、杨守随 (1466)、杨守陞、杨茂元 (1475)、杨守隅 (1484) 及杨茂仁 (1487) 等人, 他们以立朝直谅著节而闻名。在文学上, 著述较丰的有杨守陈和杨守陞等人, 一时影响甚巨。杨氏文学世家的形成以杨守陈的出仕及其撰述为标志, 杨守陞在乃兄指导下成长, 既接受家族道德文章的观念, 成为鄞县杨氏创作的后劲, 其创作及理论亦有新变。

一、杨守陈——传承家学, 杨氏文学世家兴起的标志性人物

杨守陈是浙东鄞县 (今宁波) 杨氏家族性文人创作群体兴起的标志, 在翰林任官三十余年。杨守陈 (1430-1489), ①字维新, 号晋庵、镜川先生。景泰二年 (1451) 进士, 选庶吉士, 授编修, 历侍讲、洗马、侍讲学士, 官至吏部右侍郎。有《晋庵稿》《东观稿》《桂坊稿》《金坡稿》《铨部稿》等集。在当时翰林院作家中, 邱濬 (1420-1495) 极力反对陈献章、庄昶等人对程朱理学的冲击, 杨守陈的立场与之接近。杨守陈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体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一) 德学著于文章——明代传统理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杨氏家族性文学创作特征

杨守陈的家学承接宋代陆九渊、朱熹一脉, 于陆、朱之间并无轩輊之见, 把他们都视作正统儒学的宗师。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张寿鏞所作《序》: “其学笃守程朱, 盖得南山之余绪。” [1] (1) 时人程敏政《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谓欧阳公知政教出于一而

收稿日期: 2007 - 06 - 16

基金项目: 漳州师范学院项目 (L20626)。

作者简介: 郑礼炬 (1972 -), 男, 福建永泰人,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博士。

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盖先生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栖芸先生得慈湖心学之传，至先生益大发之。……以是知先生之文诚有志于道德而不苟为空言者……其体裁不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时好……所谓道德文章之不二者。”[1]（8-9）这段话把杨守陈的家学勾勒出来。自从杨范（字九畴，号栖芸先生）宗陆九渊、朱熹的学说以来，杨家一直笃守其说。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杨氏兄弟以维护正统理学为己任。

在文学上，杨守陈深受宋代理学家文论和其祖父的影响，视诗文为学者末技。其《晋庵稿序》：“始余方孩，尝作吟诗声……九龄而学诗歌，十三而学举子业，十五而学古文。而后数岁，虽先大父恒谓诗文为学者之末务，不以专命。……十九而游京师数载，归食于家，亦数载，皆肆力于义理之学而其隙又习所谓举业者，然于古文诗歌亦间作焉……（为庶吉士后）将尽读中秘书，博采而精择之，然后发为文章，以追古作者。”[1]（3）杨范耳提面命以“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的观念，这个观念和他家传的理学结合在一起，对杨守陈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直至去世之时，守陈还交代其弟守陞：“吾文宜精选，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其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惟公之德学著于文章……”[1]（1-2）

“德学著于文章”成为杨守陈文学创作的特征，无论何种体裁的创作，都贯穿了这种文学观念。明人何乔新作《桂坊集序》对他的文学成就论述得较为具体：“杨先生所著诗、赋、铭、赞、序、记、碑、志、论、说、杂著之文……文者道之英华也，得于道者深则其发于文也阔以瞻；得于道者粹，则其发于文也贞以醇。……（在翰林历官三十余年）于所谓道者得之心而体诸身矣。故其发于文也，本周、邵、程、张之渊源，循韩、欧之架榩，其法度森严……”[1]（6-7）并称许其文“华实相副”。王?撰《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赠礼部尚书谥文懿杨公神道碑》概括得更简洁：“词虽闳博，而卒泽于理。诗尤浑雄流丽，而不戾于雅正。”[2]（9）（二）“比德”文学观及学宋文——体现着明代翰林馆阁文学共同特征的散文创作

程朱理学成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后，对文学产生指导作用，一切创作都笼罩在理学的范畴下。从明初宋濂以来，翰林馆阁文学创作就形成强烈的“比德”文学观。对于长期供职于馆阁的杨守陈来说，强烈的“比德”文学观存在于他写作的大量序文中，体现一代馆阁文学的共同特征。《雪寓解》详细地阐释“雪寓”，对亭主人的人生境况、志向做了“比德”的比喻。《送武昌同知冯君序》写冯氏将升任而未知官所在，以一夕梦境咨询于杨守陈，杨氏因其梦中所见之美竹而推断冯氏将有武昌之命，然后他在序文中大谈“比德”观：竹，植物之杰也。君子不独以比德而亦可视为政焉。彦辉擢秀于乡闾，养直于国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视乎？视竹之清，则思货贿之勿黷，视竹之直，则思断听之勿偏；视竹之空中，则思虚心以应物；视竹之荫下，则思敷泽以庇民；视竹之凌傲风雪，则思秉刚贞以御强暴；视竹之在冬夏青青，则思善始令终而不变。其恒能是六者，则诞播声誉，若竹之鸣风飏；荐沾宠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云霄……[1]（16）从这篇赠序可以看到，杨守陈的类比推理论证的能力很强，本文仅以竹进行论述，物与人之间的“比德”就有如此丰富的阐发。因为持有“比德”的文学观念，其文章和诗论存在着大量的说教，这是道德命题对审美领域的渗透，降低了他的文学成就。杨守陈的成就主要在散文创作上。其散文善于作铺陈排比。《游招宝山记》记叙了他于景泰甲戌（1454）游浙江定海的招宝山的经过。[1]（3）这篇记文和《蕙江八胜记》部分：“时春雨晴，草树郁茂，其密若栴，其鲜若濡，其色若翠，拥朝岚而凝夕霭，迺者悦焉，遐者企焉……”[1]（3）写法颇类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段写景文字。而《漱玉轩记》：“尝徐驱阔步于山椒、川濞、林莽之墟，幽闲广莫之野。……泉之淙淙、波涛之滂湃、木之蓊蓊……”[1]（2）文中说“醉翁盖先获我心者”，又表明他对欧阳修的《秋声赋》很熟悉，了解自然界天籁诸音和而成乐的道理。这些篇章体现出明代馆阁作家散文创作模拟宋代著名作家的共同路径。

（三）模拟、学习苏轼的文学成就——表现出对苏轼崇拜的时代共同风气

杨守陈学习、模拟苏轼的痕迹更浓。自杨士奇以来，明代的馆阁文学遵循“文主欧、曾，即士奇为文的主要趋向。”[3]（28）但成化以来，明代翰林作家更加膜拜的对象却是苏轼。守陈之《花香竹影轩记》设为主客问答，抒写雅趣。文中铺排和对仗的句子很多，借以阐说人生哲理，推演哲理，深化论述，深著苏轼《前赤壁赋》的痕迹，某些句子酷似苏作，如“薄暮有客造焉，坐少选，明月方出，清飏荐来……”“而叟也上不为道德之行，而下不为贵富之事，隐居独善，逍遥徜徉于香影之中而忘其为香影也，不若并花竹而忘之。花竹与吾同生，而天地与吾同体，吾焉知孰为花孰为竹而孰为我？我之为天地乎？而吾与叟皆可以忘言。”“于是，处士仰而笑，俯而饮，与客偕醉，同枕藉于轩中云。”[1]（14）《百耐庵赋》的主体部分是为章廷玉的燕处之斋

而写，文章铺排，气势雄伟，借用赋体的主客问答，把主人的高尚情操具体写出，行文在整齐中有所变化；再运以类比，形成整齐的设问句，对主人大加褒扬。

大抵他善于作排比句式，不是写景的文章也善于用排比句以增强气势，如《桃源春雨图记》，极有出新意之论，列举出多种正反例子进行论证，有苏轼为文之道。在《与胡宪副书》中，杨守陈运用多组两相对立的概念，把胡宪副的人格表现得很是峻洁。其他如《农鸣》《说舟送陈存敬会试》《重建文明楼记》中揣摩人的心理和语言之“四必曰”、《送中书舍人李应祯诗序》概括友人赠李应祯诗歌之用三个“非……则”句式等都足以为例证。《心远轩记》为杨氏乡邑富民孙叔礼的心远轩而作，此文很有翻新出奇的写法，[1]（16-18）这大概是走苏轼的文章套路。而《雪寓解》[1]（20-22）更是把苏轼的精神都

学到了，文中有“疑者”之言，有两个“晓之者”之言，有“笑之者”之言，最后由“笑笑者”以比德的解释，把全文引导到明代翰林文学宗经的观念上去，结束全文。通过数人的疑惑和辩驳，层层递进地最终把“雪寓”的含义揭示出来。前两“晓之者”与“笑之者”的形象通过他们的语言刻画出来，使人有“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嘲讽意味，同时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排斥了诸种对“雪寓亭”寓意的曲解。此文的写法吸收了汉赋的对话体加以发展，辩驳叠出而语义不重复，其中也可看到苏轼文章和思想对他的影响，如第二位“晓之者”的话是苏轼《前赤壁赋》关于水月变与不变、消逝与永恒关系探讨的翻版。

杨守陈又吸取庄子的语句为己用。《送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公序》对《庄子·逍遥游》句子加以糅合使用，借鹏为喻，用来形容程信（程敏政之父）。《送刑部尚书陆公致政序》的结尾也用上类似句子。另如《祭张金都文》引《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漱玉轩记》模仿《庄子》的句式。杨守陈熟悉《庄子》，又把它文法运用到文章的行文中去，如《小湖山赋》等。他只是把庄子文章的气势运用到其阐说“天地”义理的论证之中去，但其中也可以看出苏轼对他的影响。

二、翰林院文学创作宗宋的大背景

杨守陈的文学创作却又投射出翰林院文学创作宗宋的大背景，反映了翰林院作家共同的创作方向。在成化、弘治之间，翰林院作家对宋代的散文、诗歌等各体文学成就极为推崇，崇尚宋代翰林作家的风流，极力肩随宋人的创作。较之明代前期的翰林作家创作，以下两个方面的新变都体现出宋人诗文对成、弘年间翰林作家的影响：

（一）改写、翻新宋人作品成为翰林院作家创作的重要方式，杨守陈也创作了此类作品

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翰林院作家创作中改写前人名篇的做法，异常繁荣。杨守陈《彭文宪公文集原序·行实》：“古今文至众矣，创意立辞者，固人人异，后或扩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攘之，亦莫能同……”[4] 这里归纳出当时翰林作家创作的四种路径，语或含讥讽，对当代翰林作家创作进行针砭。程敏政题杨守陈《桂坊稿》后：“近世之文，出于天资者，或歉于本原；由学力者，或伤于摹拟”[1]（8）

意思与此相同。即使大家如邱濬者亦未能蹈出这些创作俗套。如明代翰林院作家以石钟山为题进行创作，或诗或文，体裁不一。柯潜（1423-1473）的《石钟山在九江湖口县》年代较早。这篇赋作大体上是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来，但是很多处又夹杂了唐诗、苏轼的《前赤壁赋》和陆游诗的语句，末句肖似词作之句，这是一个创造，其同题诗《石钟山》是对苏轼同题作的革新。吴节（1397-1481）的《游石钟山记》《湖口石钟山诗五首》作于成化八年（1472），也是明代翰林文学中石钟山题材的诗文创作。倪谦（1415-1479）的《湖口石钟山为库部王郎中恕赋》语本苏轼之文，欲以诗直追苏轼之文。刘定之（1409-1469）《石钟山歌》、邱濬《石钟山赋有序》，都改变原来的体裁，重新进行创作。程敏政（1444-1501）作《石钟传》，以苏轼《石钟山记》的部分内容来形容人物，是一种很特殊的写法。杨守陈亦有同题文《石钟山铭并序》。在序中，作家概述了酈道元、李渤、苏轼、周必大等人对石钟山的命名之因。该铭为明太祖攻伐陈友谅歌功颂德的作品，改变写作角度，不与苏轼原作争锋，但是文学价值却不堪陈说。

（二）创作禁体物诗，诗歌创作出入唐、宋，学习宋诗成为翰林院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在成、弘年间，翰林院作家不仅在散文创作上踪希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宋代诗歌创作更成为一时风气，在禁体物诗、限韵诗和集句诗的创作中可以得到印证，从而构成当时翰林院在诗文创作领域对宋人的崇拜，改变了唐代诗文在明代翰林院的独尊地位。禁体物诗，又名“白战体”，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诗体，而宋人喜好此种体裁。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了宋初许洞与九僧在诗会上约为禁体的故事，[5]（266）欧阳修自己也创作禁体诗，并被后世视为翰林风流。成化、弘治年间，明代诗坛发展、兴盛和宋诗之作的风气，大量的翰林作家制作禁体诗。成化十二年（1476）冬，侍读倪岳、侍讲程敏政、修撰陆钺、编修陆简等斋宿翰林，用欧阳修故事，相与韵联句，进行禁体物诗创作，一时这种创作之风大盛，影响很广。杨守陈的好友刘忠（1452-1523）亦有古体《和东坡江上值雪和子由韵禁体》（《马》良佐和东坡雪中禁体犯盐银数字戏呈）。在宋翰林极盛行的禁体物诗基础上，明代成、弘间的翰林院作家进一步发展出限韵诗的创作。倪岳作有《游西山圆静寺晶庵限韵一首》等诗，程敏政的禁体物诗存作较少，而限韵诗创作较多，如《司言仪宾戒酒限韵索诗》等诗，这些诗歌是当时翰林作家比试诗才的必然结果，与禁体物诗一样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追随宋代诗风的产物。

与此同时，翰林创作中还出现大量的集句诗，最能体现明代诗风宗宋的转变。明人杨慎和谢榛都认为集句诗起源于晋代傅咸的《七经》诗，而到了宋朝王安石开始大力创作这一体裁诗歌，成为宋诗创作的重要体裁。李东阳、程敏政等著名的翰林作家都从事集句诗的创作。分析集句诗中的诗句，可以显示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态度。宋人寇准、陈抟、李昉、石介、欧阳修、宋祁、孔平仲、曹翰、苏舜钦、刘摯、苏轼、张咏、司马光、程颢、王安石、朱淑真、张耒、黄庭坚、秦观、贺铸、陈师道、王禹偁、黄裳、潘大临、陈与义、陆游、巩丰、魏野、邵雍、唐庚、严羽、张栻、陆游、杨蟠、吕颐浩、赵师秀、陈与义、章泉、华岳、王之道、朱熹、真德秀、曾几、姜特立、杨万里、赵抃等人的诗句，都为李东阳、程敏政等翰林大家所集，反映了他们对宋人诗作的熟悉程度。杨慎的好友安磐（字公石）曾经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妙于集句”，[6]（842）说明翰林院宗宋诗风对文人的熏染。“踪希宋体，音闋盛唐乐府，或创新，制叠韵，竞侈联篇，”[7]（635）概括了成、弘之时翰林院作家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杨守陈对苏轼的爱好也反映了翰林院宗宋的文学创作大背景对他的影响。

三、杨守陞——浙东杨氏文学世家的后劲

弘治二年（1489），杨守陈去世，但杨氏家族性的文学创作群体已经形成，时人拟比于宋代三苏。杨氏家族性文学创作绵延到杨守陞的曾孙杨德周，前后共四代人。守陈之后，杨氏家族中最以文学著称者有杨守陞。

杨守陞（1436-1512），字维立，号碧川，守陈弟。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累官翰林侍读学士，与守陈共事于翰林院二十余年，对掌南北翰林院，著作繁富。与乃兄相比，其创作与文学观点既有相承的一面，也出现了新变的成分。

（一）“无一不根诸心而律诸道”——更加保守、退化的道学家文学观

杨守陞在守陈身后二十余年继续任职于翰林院，使杨氏家族的文学观得以坚持，并成为当时翰林院中重要的创作流派。杨守陞严守家法，从小受到其兄长的教诲，《碧川文集自序》称“学文于镜川，”[8]（12）推崇兄长的文风：“学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词章之所发越，皆道德之英华，伦理之攸系”，道德与词章结合紧密，德学著于文章而而更加保守，过分强调道德对文学的作用。崇祯年间，郑以伟作《赠少保南京太宰杨碧川诗文选序》，他对杨守陞的论述更加深入：“长沙（李东阳）、雒阳（刘健）让其醇正，与文懿（杨守陈）角，亦僧弥之于法护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乐、百职修举……无公之文，则天下亦将不足于治，而顾可已乎？其他杂文，虽不一种，种不一制，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体，车马、舟楫之不可已于游……即其游戏三昧，亦若钟鼎彝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无用。”[8]（1-3）连李东阳（长沙）都为杨守陞的“醇正”——即其创作中的道德成分所屈，其“根心律道”的色彩是相当浓厚的。杨守陞之于乃兄，犹“僧弥之于法护”，继续坚持其家学。李康先《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叙》谓其“文学议论，隐然有文懿风。”[8]（8）

杨守陟曾经教习庶吉士，通过这个途径，使其文学观得以传播，所以他的文章虽无甚文学价值，但在当时代表着翰林院文学创作的一个流派。陈琳《碧川文选序》：“每进诸生于馆下，语之曰：‘近世之学，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其道，于其词章，浮夸为工，奇僻为异，叛经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当于口耳次长之外求之，否则艺焉已耳。’”[8]（10）守陟在创作上反对当时新奇文风的倾向，在哲学上反对陈献章白沙学派及王守仁阳明学派“叛经去理”的新思潮，主张文章根心律道。在翰林院内，杨氏兄弟和观点接近的作家形成有着独特文学主张的创作群体。

（二）“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室”兼师则宋人——取径稍异其兄的方法论

杨守陟的散文创作向韩愈学习，取径与杨守陈稍异。其文《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对韩愈赞扬有加：“余是以知为政之道，亦惟师其意，不师其迹也。”[8]（5）文章中虽然谈的是为政之道，但是他所谓的为政之道是从韩愈的文法领悟出的，可以看出他对韩愈的文法下过研讨和学习的工夫。李康先的《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叙》对杨守陟学习韩愈进行了详细论证：“碧川杨先生则著作高骞，周情孔思，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室，以眎永叔。”[8]（7）

杨守陟的文学创作不是完全只师从韩愈，而是杂取宋人。如其《凝清堂记》一文，他化用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句式，如“层峦叠嶂，效奇献秀者，环拱而内向”、“春华秋实，暑月繁阴，霜雪时降，玉树璫林。四时之景，无弗清者”[8]（11）等句与《醉翁亭记》的文字依稀仿佛相类。而他的诗论《伟溪小稿序》则直接用宋人论诗成句：“……今观其诗，众体皆具，六义攸存，言近而旨远，词约而思深，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时或逸思骏发，即事咏物，得天机，而忘其骊黄牝牡……”[8]（32-33）这是杨守陟为方谦诗集所作之序，评论语引用宋代梅圣俞论诗的语句：“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5]（267）可见他对宋人的诗话很熟悉。当然，并不仅仅如此，他还称引苏轼等人的文章，如《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刘宪使传》等文皆引用了苏轼对某事的评论，这说明他对苏轼的文集也相当熟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杨守陟对宋人的文学和诗学主张有所学习、继承，与其兄长文学观既有相承，亦有所发展，也与当时文坛普遍学宋的风气分不开。杨守陟的交游中有马良佐、刘忠、刘春等翰林院作家。二杨与二刘皆主论道德文章，形成一个很特殊的创作群体，而且他们又都学习苏轼。刘春对三苏的人、事很熟悉，其《寿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澄江先生尹公诗序》《重修东坡书院记》都足以说明刘春很景仰苏轼为首的三苏文章。数人中尤以刘春的文学主张与杨守陈兄弟较为接近，往返有《和碧川杨少宰四韵》等诗，他们应当是当时一股较有影响力的翰林作家群。

注释：

①其同年王?认为他卒于弘治己酉年（1489），而享年六十五（《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赠礼部尚书谥文懿杨公神道碑》，《思轩文集》，卷十三，页九），则他的生年在1425年。

参考文献

[1] 杨守陈. 杨文懿公文集[M]//王德毅. 丛书集成续编：第407册. 上海：上海书店，1995（影民国张寿鏞四明丛书约园刊本）.

[2] 王?. 思轩文集[M]//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第132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影明弘治刻本）.

[3]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 彭时. 彭文宪公集[M]//季羨林.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5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5（影清康熙五年彭志桢刻本）.

[5] 欧阳修.六一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杨慎.升庵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陈田.明诗纪事[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17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影清光绪贵阳陈氏听诗斋刻本).

[8] 杨守阯.碧川文选[M]//王德毅.丛书集成续编:第7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5(影民国二十七年张寿镛四明丛书约园刊本).